汉学家品读中国经典——

册海同光 中国精神

中国经典书目不仅是研习汉语言文字的载体，更是读懂中华文明的重要窗口。在“世界图书与版权日”到来之际，本报特邀10余位来自世界各地的汉学家，分享他们与中国经典结缘的故事以及从中品读出的中国文化精神。翻译即再造，朗读即共情。每位汉学家都推荐了一句感触深刻的书中箴言，以朗读之声跨越山海，让世界听见中华文明的千年回响。

《古文观止》：一书走近中国古典文学

青年汉学家、美国普盈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**尚·撷福**

我最初与中国文学结缘，正是因为着迷于悠久的中国文学史。用同一种语言，读到数千年前先人写下的文字，这在世界上是罕见的。

年轻时，我常为古希腊、古罗马文明的衰落而遗憾，那些伟大的文学传统随之中断。但在中国，朝代更迭，文学传承却从未断绝。《古文观止》收录各朝经典散文，是中华文脉的见证。对于我这样视文言文为挑战的外国读者，篇幅短小的散文合集，是走近中国古典文学的合适入门读物。

《古文观止》中令我印象最深的，是张溥的《五人墓碑记》。5位普通民众因不平而起，慷慨赴义，保护了全城百姓。张溥问道：“凡富贵之子，慷慨得志之徒，其疾病而死，死而湮没不足道者，亦已众矣……独五人之皦皦，何也？”这5位普通百姓，以生命捍卫了正义，为人民、历史所铭记。

张溥由此写下：“亦以明死生之大，匹夫之有重于社稷也。”作为律师，我深知公平正义是法律最核心的价值。而张溥之言让我意识到，正义并不只存在于制度与条文之中，更深植于人民心中。人民，才是支撑公平正义坚实的根基。也正因此，数百年前5个无名之人的选择，仍能穿越时光，在《古文观止》中与我们相遇，发出回响。

（本报记者 **李晓宏**采访整理）

《墨子》：为文明互鉴提供有益参考

乌兹别克斯坦汉学家、乌兹别克斯坦丝绸之路出版社总编辑 **伊尔伽舍夫·康德**

2022年，我将《墨子公开课》一书翻译为俄语版。在翻译过程中，我逐渐被墨子的思想所吸引，进而产生强烈共鸣。

最让我震撼的是，墨子的思想展现出超越时代的前瞻性与普适性，其智慧之光跨越千年时空，对当今世界面临的诸多现实问题依然具有重要启示意义。

比如，“兼爱”思想强调超越亲疏远近的普遍关爱，与现代社会提倡的平等与包容精神高度契合；“非攻”思想与国际社会反对侵略、维护和平的广泛共识不谋而合；墨子倡导的理性、务实与互利原则，有助于不同国家在交往与合作过程中，减少冲突、增强互信。

这种古今呼应，促使我决定进一步研习《墨子》，并着手将其翻译成乌兹别克语。从文化比较的角度来看，《墨子》内含的思想与乌兹别克斯坦传统文化中强调的仁爱、互助以及社会责任感有相似相通之处。在中亚地区的文化传统中，人们同样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关怀与团结，这使得墨子的思想理念在跨文化语境中具有蓬勃的生命力与吸引力。

目前，我对《墨子》一书的翻译工作正在紧张有序地进行中。为了更准确地理解和翻译，我不仅系统研读了不同版本的《墨子》原文及其注释，还查阅了大量关于中国先秦哲学、历史背景以及相关思想流派的资料，以便更好地把握文本语境。此外，我特别重视术语的统一和表达的准确性，力求在忠实原文的基础上，使译文既符合乌兹别克语的表达习惯，又能传达原著的思想内涵。希望通过我的努力，让更多乌兹别克斯坦的读者领略墨子思想的魅力，并对中国文化产生更加浓厚的兴趣。

（本报记者 **严 瑜**采访整理）

《论语》：在跨文化理解中不可替代

阿根廷青年汉学家、长春师范大学文学院教师 **马西**

在我正式学习中文之前，曾读过一本西班牙语版《论语》。但那时我对中国的历史、文化和思想传统了解有限，加上年纪尚小、阅历尚浅，并未真正走进它的世界。

来中国攻读硕士期间，有一门课讲到《论语》，老师的讲解让我对这部中国典籍有了深入理解，并深深折服于其中的思想。

此后，我多次重读《论语》以及中国历代学者对它的解读，每次都有不同的领悟和收获。

作为一名研究中国、长期从事语言文化传播的学者，我认为《论语》在跨文化理解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，是沟通中外文化与减少误解的重要桥梁。

例如《论语》中关于“仁”“礼”“学”的思想，构成了理解当代中国人思维方式、价值观念与人际关系逻辑的核心线索。在跨文化传播实践中，这些内容很容易引发共鸣。

读《论语》对我的学术研究和日常生活都产生了深远影响。在学术层面，它帮助我更深入地理解中国文化，也让我更清楚地意识到：语言背后一定有文化，文化背后一定有价值观。这正是我在跨文化传播中一直试图阐明的问题——语言不只是工具，更是一整套思维方式的载体。在生活层面，《论语》不断提醒我应当如何学习、如何待人、如何反思自己。

我也希望将自己读《论语》的心得分享给更多阿根廷朋友。每次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孔子学院举办中国文化讲座时，我都会提到《论语》。可以说，我所做的关于中国的讲座，没有一场是完全不涉及《论语》的。

我希望将来能贴近当代读者，结合自己的理解，去翻译和介绍《论语》，将它的智慧分享给更多人。这项工作极具挑战，但我愿意尝试，为之努力。

（本报记者 **赵晓霞**采访整理）

《乡土中国》：理解中国社会的钥匙

澳大利亚汉学家、商业战略咨询顾问 **区吉民**

培根说，有的书只需浅尝辄止，有的书可以囫囵吞下，只有极少数的书必须细嚼慢咽。费孝通的《乡土中国》，显然属于最后一类。

2013年，我第一次读到这本书。我的博士生导师高默波推荐说，这是理解中国社会的一把钥匙。不过，我真正感受到这本书的分量，是在中国生活了10年后重读它时。它点明了许多我长期“有感却无名”的东西，也解答了我一直以来的疑惑：从内部看，中国人的社会生活究竟是怎样被组织起来的？

书中，作者费孝通将严谨的学术表达融入对日常生活的细腻书写之中。他认为，中国社会扎根于安土重迁的乡村生活：人人彼此熟识，知识的传递不靠抽象的法条，而靠日常相处与长辈的言传身教。他指出，中国的乡土社会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共同体，而是一种礼俗社会；与之相对的，是以契约和法律为边界的法理社会，更接近现代西方社会的面貌。

最打动我的，是他提出的差序格局概念——中国社会中的人际关系并非“捆柴”式的团体格局，而更像是以个人为中心向外扩散的同心圆：最内圈是家人，其次是朋友，再往外是一般熟人，最外层是陌生人。道德义务、信任感和伦理责任，都随着圆圈的外扩而动态变化。

重读时，触动我的不再是这个概念的新奇，而是它的熟悉——在中国生活了10年之后，一本书把你长期以来模模糊糊的感受说得透彻明白，那种豁然开朗的瞬间很难忘记。

即便已经读了两遍，我对这本书仍远谈不上“读完”。在中国高速发展的当下，你仍然可以看到、感受到由土地和乡村生活塑造出来的社会底色，这正是《乡土中国》帮助我辨认出来的。

（本报记者 **陈子涵**采访整理）

《老子》：蕴含对当代社会有用的智慧

美国汉学家、南开大学哲学院副教授、“全球老学”研究中心主任 **邵遥侠**

14岁时，我第一次接触《老子》（又称《道德经》）这本书，当时我对大自然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特别感兴趣。书中蕴藏的哲理与我的一些想法有相似之处，同时又十分新奇，让我希望能更深入地了解这部著作。这段经历，推动我走上了“全球老学”研究之路。

《老子》中的一些内容对人与人、文化与文化之间的交流具有指导意义。比如“柔弱胜刚强”，高高在上的命令让人反感，但如果将自己“降低”到与对方一样的高度，对方会感觉到被尊重、被理解，这样就能更好地沟通，这种“示弱”并不是真正的“弱”，它更像我们今天常说的“共情”。老子说：“圣人无常心，以百姓心为心”，也强调换位思考。老子这方面的思想影响了我。在开展跨文化交流时，我尽可能站在对方的角度思考交流方式，而不是把自己作为美国人的视角当作普遍标准。

《老子》有2000多种译本。这么多人去翻译它，是因为不同人从不同视角解读《老子》，都能得出对自己有用的智慧。现在，社会的快速变化和随之而来的压力让不少年轻人感到焦虑，急于求成。《老子》提醒我们，宇宙秩序和人生本来就不是单线发展的，“曲则全”“祸兮福之所倚”，这有助于年轻人学会灵活处世、应对挫折。

（本报记者 **李嘉宝**采访整理）

《易经》：从他人视角理解对方

德国汉学家、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 **谢林德**

应出版社邀请，我此前翻译了德文版《易经》，起名为《易经——新德译本》。我重视思想脉络，在翻译中依据对该书所处时代的理解，来阐释其思想世界，并在译本附录中详尽注释。

从《易经》成书史看，其占辞中存在不同文本层次，其“经”“传”两部分要区分来读，并在“经文”（即卦象与卦爻辞）中区分出不同的文本类型。我的译本参考了一些西周文献、金文文献等，并与《诗经》中的句子比较，从文学角度阐释其政治意义。

德国汉学家卫礼贤认为《易经》是一部智慧之书。事实上，《易经》占辞中所蕴含的思想世界并不容易理解，其语言也较难解读。一代代后世研究者的解读，不断完善了其观念体系。《易经》中蕴含的思想世界与现代思想世界存在显著不同，我们应当保持理性态度，并以谦逊之心看待古代思想。研究古代文化以及解读古人思想世界的价值在于：试图从他人的视角去理解对方。在理解不同文明、促进文明互鉴的过程中，这种理解本身便极具价值。

（本报记者 **彭训文**采访整理）

《鲁迅全集》：超越国界的灵魂共鸣

韩国汉学家、陕西师范大学特聘研究员 **朴宰雨**

在我研读过的众多中国文学作品中，《鲁迅全集》始终是最令我魂牵梦萦、体悟至深的不朽经典。

鲁迅的文字针砭时弊，以如椽巨笔勾勒众生相。《狂人日记》以锐利之笔刺破封建礼教的虚伪面纱，时至今日依然振聋发聩。《阿Q正传》则以冷峻而不失悲悯的笔触，使读者在苦笑与自省中照见自我。而《祝福》中祥林嫂的悲剧，则以近乎无声的沉痛，呈现出封建纲常对个体生命的无情绞杀与吞噬。《记念刘和珍君》中那句“真的猛士，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，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”，不仅是对逝者的崇高祭奠，更升华为一种跨越时空、感召后世的精神图腾。

我与鲁迅的“缘分”始于20世纪70年代。1973年，我进入首尔大学中文系读书。当时韩国偶有前辈学者涉足鲁迅的研究与译介，每每发现这些零星的足迹，都会令我心生激动，并从中汲取继续深入的勇气与动力。本科期间，我完成了论文《鲁迅的时代体验与文学意识的展开过程》，由此开启了与鲁迅的漫长对话。

鲁迅始终秉持对“人”的深切关怀。每逢重读，我总能感受到一种超越国界的共鸣。韩中两国的历史文化有诸多相通之处，因此韩国读者与学界始终对鲁迅怀有亲近感，并以各自的方式主动走近、诠释、再发现他。这种跨文化的相遇与对话，或许正是鲁迅思想恒久生命力之所在。

（本报记者 **张鹏禹、黄敬惟**采访整理）

《唐诗三百首》：在唐诗中遇见中国

印度索梅亚大学国际关系系中国研究中心副教授 **沙海丽**

唐诗不仅是中国文学的高峰，更是一面镜子，映照出中国文化深处的精神气质。它以简练的语言承载深远的意境，将情感、自然与哲思融为一体，展现出“言有尽而意无穷”的美学传统。在《唐诗三百首》中，我尤其喜爱李白的《静夜思》，不仅因为它脍炙人口，更因为它以最朴素的方式呈现出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，也与我在阅读泰戈尔作品《吉檀迦利》时所感受到的印度思想产生了深刻共鸣。

这首诗只有短短几行，语言平实，却情意悠长。月光如水，静静铺展，既照亮了夜，也唤起了心中的思念。诗人一“举头”，一“低头”，在简单的动作之间，展开了一种人与自然、人与内心的对话。

这首诗体现出“道法自然”的思想。月光与心境相互映照，情与景融为一体。正如《道德经》中所说：“道法自然。”诗中的一切顺其自然地发生，展现出一种不张扬却深刻的和谐之美。

在这样的意境中，我也对中国的“仁爱”有了新的理解。仁爱并不总是宏大的道德宣言，它往往始于最朴素的情感，即对家人、对故乡的深切牵挂。正如《论语》所言：“仁者爱人。”而这种“爱”的根源，恰恰可以在诗中那不言说的思念中感受到。它自然流露，温和而深远。

诗人没有直接倾诉孤独与痛苦，而是在静夜中默默承受着距离与分离。这种内敛的情感，看似平静如水，实则蕴含着一种坚韧的力量。

这样的情感体验也让我联想到《吉檀迦利》中，泰戈尔常借自然表达内心，让光、天空与人的情感相互交融。这与《静夜思》中月光与思念的关系不谋而合。两种文化虽各自独立，却在对自然与情感的理解上产生共鸣。

通过这首诗，我逐渐明白，中国文人的思想并不总是在宏大的叙事中呈现，它们也存在于一个静夜、一束月光、一份思念之中。正是这种简约而深刻的表达，使唐诗能跨越时间与文化，持续打动人心。

（本报记者 **贾平凡、林子涵**采访整理）

《大学》：把理想落实为可实践路径

苏丹青年汉学研究者、北京语言大学博士生 **吴刚**

在我读过的中国文化典籍中，《大学》最令我触动。打动我的不只是它提出“大学之道，在明明德，在亲民，在止于至善”，更在于它把理想落实为一条可实践的路径。

“明明德”不是凭空塑造一种新的美德，而是使人本有的善端重新显明。《大学》中讲“诚意”“正心”，再到“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”，层层递进。

让我触动最深的是“欲治其国者，先齐其家；欲齐其家者，先修其身”。它时刻提醒我，公共秩序并不只靠制度维持，而且离不开人在具体关系中的责任感、自我节制与相互体谅。

《大学》的思想加深了我对中国文化精神内涵的理解。在中国学习和生活时，我常听到“家是最小国，国是千万家”，也看到许多人在讨论升学或工作时，会自然把父母期待、家庭责任与个人选择放在一起。

我印象很深的是和一位中国朋友讨论是否去国外工作的经历。我会首先想到薪资和发展，他的第一反应却是：“如果我去了国外，那我的爸妈怎么办？”

起初我把这理解为一种生活习惯或文化差异，读了《大学》后我意识到，这正是中国文化中“齐家”伦理逻辑的体现。中国文化重视人在关系中的成长和在责任中的自我完善。

当然，今天的家庭结构与社会分工已不同于古代，但《大学》揭示了一个至今仍颠扑不破的道理：一个人若不能在亲密关系中学会信任、担当与自我约束，就很难真正承担更广泛的公共责任。

读《大学》，我感到它并非古老而遥远的文本。“君子必慎其独也”对现代人同样重要。所谓“慎独”，并不是独处时表面的谨慎，而是在无人注视之时，仍能不自欺地面对内心，守住自己的底线。

在我看来，《大学》讨论的是人如何修养自身、与人相处、走向公共生活。这部数千年前的书，直到今天依然能够照亮我们的生活。

（本报记者 **黄敬惟、张鹏禹**采访整理）

《孙子兵法》：从军事经典到处世良方

世界汉语教学协会理事，俄罗斯国立人文大学语言学院东方学系主任、孔子学院俄方院长 **易福成**

我从青年时代开始研读《孙子兵法》，直接从原文入手，并未觉得文字晦涩，反觉清晰易懂。很多人觉得文言文难学，但在我看来，从中国古籍里吸获的智慧与成长，远超学习古文所需付出的努力。

这本中国现存最早的兵书，让我更加深刻地理解中国传统思想内核。我发现，孙子的军事思想与《道德经》内涵相通。比如“百战百胜，非善之善者也；不战而屈人之兵，善之善者也”，其境界与道家反对强制、以柔克刚的理念高度契合。

随着阅读深入，我意识到《孙子兵法》也是生活之道、处世之学，是切实可行的方法论。“知彼知己，百战不殆”“夫未战而庙算胜者，得算多也”“兵无常势，水无常形”等经典论述，句句实用。它们启示我：与人相处既要了解对方，更要认清自己；做事前要深思熟虑，不盲目行动；面对变化要随机应变，不拘泥定式。《孙子兵法》蕴含的辩证思维与系统思维，已经深刻融入我的认知，让我学会从整体出发看待自身与世界。

为深入探究中国文言典籍的语言特点，我在北京大学攻读古代汉语博士学位期间，对具有典型价值的《孙子兵法》开展了专书研究，探讨其文言文线性句法与非线性深层语义的映射关系，提出文言文词类应纳入语义维度的研究观点。

从《孙子兵法》原文到《十一家注孙子》《武经七书》等相关典籍，我的研读不断深入，曹操、杜牧、梅尧臣等历代注家并非只做简单释义，而是结合各自时代背景不断拓展创新，让孙子的思想在传承中持续得到验证和丰富，最终形成跨越时代的智慧集成。

在当下国际格局中，《孙子兵法》的时代价值愈发凸显。它反对强制对抗，强调审慎、谋略与包容，能够为化解分歧、增进互信与合作提供有益参考。

（本报记者 **陈静文**采访整理）

《和合文化关键词》：以“和合”理解中非文明共鸣

布隆迪青年汉学家、南京大学博士生 **班超**

在布隆迪传统文化里，有一句古老的谚语：“人之所以为人，是因为他人的存在。”当我翻开《和合文化关键词》，读到书中对“和合”的定义，读到中华民族对“贵和尚中、善解能容、厚德载物、和而不同”的追求，我立刻感受到了两种文明跨越山海的精神共振。

这本书最打动我的，是它展示了古老的中国智慧如何在当下焕发现实意义。比如，书中讲解了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的理念和“天人合一”宇宙观之间一脉相承的联系；将《尚书》中的“协和万邦”与中国一以贯之的和平发展道路相印证……我意识到，“和合”这一理念贯穿中国历史，并仍在塑造中国如今的发展路径和国际交往方式。

书中讲到，西周末年思想家史伯提出“和实生物，同则不继”，意思是说不同事物在和谐共处中可以相互补充、辅助，从而形成新的事物。中国人追求的“和合”，与非洲传统文化推崇的多样性和共同体协商不谋而合。

后来，我深入研读这本书，完成了论文《不同文明对“天地人时”和谐规律的认知共性——关于中非传统精神之间对话的思考》。我愈发坚信，中非文明对话根植于文化传统。在当今世界，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，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，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，才是人类共赴未来的坦途。

我愿将此书推荐给关注全球治理的读者朋友。它不仅是一把解读中国的钥匙，更是一份来自中国的邀请——邀请我们共同想象一个更加包容、和平、生生不息的世界。

（本报记者 **王晶玥**采访整理）

《孝经》：中国道德哲学深植社会生活

德国青年汉学家、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后 **凯瑟琳·纳格尔**

一年半前，我初次走进儒家思想的世界。于我而言，中国道德哲学不仅是一片崭新的研究领域，更是一扇理解伦理生活的窗口。

此前我专注于中国当代教育研究，虽然也触及了道德养成的问题，但多半停留于经验，缺少清晰的哲学根基。《孝经》以其简练而深邃的思想，吸引并启发着我。

捧读《孝经》时，最令我触动的是它对“孝”的阐发：它不单单是家庭内部的德行，更是一条可以由内而外层层展开的根本原则——从亲人延展到国家，进而贯通整个社会秩序。其中“夫孝，德之本也，教之所由生也”一句，让我顿悟到：道德的培育并非始于抽象的原则，而是深深扎根于具体的人伦实践之中，家庭也因此成为德行生长的关键土壤。

由此，我对“仁”的含义也有了新的理解。过去我常把它看作个人内在的道德品性，比如善意或同情心；而《孝经》则向我展示了一个关系性的视角：“仁”并不是孤立自存的，而是在以尊重和责任为基础的人伦互动中慢慢生长出来的。

《孝经》篇幅虽短，却勾勒出一幅兼具个人与社会维度的道德图景。它让我更加理解中国文化，也促使我重新审视道德教育的方式：与其依赖抽象规则，不如从活生生的人伦关系与实践出发。

（本报记者 **王慧琼**采访整理）

《传习录》：向内寻找治愈世界的力量

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德国籍教授、东西方关系研究中心主任 **大卫·巴拓识**

2005年，我在贵州贵阳第一次看到明代哲学家王阳明的雕塑后，就对这位儒家思想大师产生了巨大兴趣。他的哲学思想是什么？背后的儒家精神是什么？其思想启迪如何跨越时空？

带着这些疑问，我多年来一直潜心钻研王阳明的代表作《传习录》。该书系统阐释了王阳明“心外无理”“知行合一”与“致良知”的核心要义。它不仅是一部哲学巨著，更是一部教人如何在纷繁世界中安身立命的实践指南。

《传习录》教导我们要净化自己的心灵，从而激发出蕴含其中的内在道德力量——良知。凭借这种内在、天然的良知，我们能克服私欲对心之本体的遮蔽以及这种遮蔽所带来的“恶”。良知就像心中的指南针，它指引我们走向思想与行动的统一（知行合一），从而获得内心的澄明、正直与公正，并融入更广阔的天地宇宙之中。

我认为，“良知”是所有人共享的一种生命力，如果所有人都可以“致良知”，那么全人类就可以“同呼吸”。宇宙的至善，正是在于认识到人与万物生灵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结。由这股至善的生命力出发，能推及仁爱、爱物的仁心。

王阳明的哲学融合了中国儒家、道家、禅宗的思想精髓，令人深思且有跨文化的共鸣。康德倡导的内心道德法则，与王阳明的“个个人心有仲尼”理念相似。王阳明对“自信”和“致良知”的强调，也与歌德不谋而合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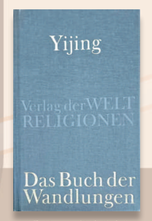
值此“世界图书与版权日”之际，我向每一位读者诚挚推荐王阳明《传习录》。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，我们翻开这本书会更明白：治愈世界的终极力量，不在外部，而就蕴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良知之中。

（本报记者 **贾平凡、林子涵**采访整理）

《古文观止》

《论语》

《道德经》中英双语版
邵遥侠是本书编委会成员



《易经——新德译本》
谢林德译

《鲁迅全集》

《孙子兵法》

《孝经》

《墨子公开课》俄语版

《乡土中国》

《唐诗三百首》

《大学》阿拉伯语版

《和合文化关键词》

《“博学的无知”抑或“良知”——库萨的尼古拉与王阳明哲学思想》
大卫·巴拓识著

尚·撷福：
《古文观止》中令我印象最深的，是张溥的《五人墓碑记》。这5位普通百姓，以生命捍卫了正义，为人民、历史所铭记。我意识到，正义并不只存在于制度与条文之中，更深植于人民心中。

马西：
语言背后一定有文化，文化背后一定有价值观。语言不只是工具，更是一整套思维方式的载体。《论语》不断提醒我应当如何学习、如何待人、如何反思自己。

邵遥侠：
老子说：“圣人无常心，以百姓心为心”，这方面的思想影响了我。在开展跨文化交流时，我尽可能站在对方的角度思考交流方式，而不是把自己作为美国人的视角当作普遍标准。

谢林德：
研究古代文化以及解读古人思想世界的价值在于：试图从他人的视角去理解对方。在理解不同文明、促进文明互鉴的过程中，这种理解本身便极具价值。

朴宰雨：
鲁迅始终秉持对“人”的深切关怀。每逢重读，我总能感受到一种超越国界的共鸣。

易福成：
《孙子兵法》也是生活之道、处世之学，是切实可行的方法论。“知彼知己，百战不殆”“夫未战而庙算胜者，得算多也”“兵无常势，水无常形”等经典论述，句句实用。

凯瑟琳·纳格尔：
《孝经》勾勒出一幅兼具个人与社会维度的道德图景。它让我更加理解中国文化，也促使我重新审视道德教育的方式：与其依赖抽象规则，不如从活生生的人伦关系与实践出发。

区吉民：
最打动我的，是《乡土中国》中的差序格局概念——中国社会中的人际关系并非“捆柴”式的团体格局，而更像是以个人为中心向外扩散的同心圆，道德义务、信任感和伦理责任，都随着圆圈的外扩而动态变化。

沙海丽：
中国文人的思想并不总是在宏大的叙事中呈现，它们也存在于一个静夜、一束月光、一份思念之中。正是这种简约而深刻的表达，使唐诗能跨越时间与文化，持续打动人心。

吴刚：
《大学》讨论的是人如何修养自身、与人相处、走向公共生活。这部数千年前的书，直到今天依然能够照亮我们的生活。

伊尔伽舍夫·康德：
墨子倡导的理性、务实与互利原则，有助于不同国家在交往与合作过程中，减少冲突、增强互信。

大卫·巴拓识：
我向每一位读者诚挚推荐王阳明《传习录》。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，我们翻开这本书会更明白：治愈世界的终极力量，不在外部，而就蕴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良知之中。

策划统筹：严 冰 李晓宏 熊 建 张意轩
责任编辑：彭训文 陈静文 王慧琼
版图制作：潘旭涛
音频编辑：陈子涵